

陶希圣与
『食货』学派研究

陈园园◎著

陶希圣与

『食货』

学派研究

陈园园◎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陶希圣与“食货”学派研究 / 陈园园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6

ISBN 978-7-308-18354-3

I. ①陶… II. ①陈… III. ①陶希圣(1899—1988)
—人物研究 IV. ①K82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30324 号

陶希圣与“食货”学派研究

陈园园 著

责任编辑 吴伟伟 weiweiwu@zju.edu.cn

责任校对 杨利军 牟杨茜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隆盛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绍兴市越生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45 千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8354-3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stmall.com>



陈园园

1982年生，河南驻马店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宁波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研究。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题旨	(1)
一、研究背景	(1)
二、研究目的	(4)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5)
一、民国时期	(5)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6)
第三节 内容与思路	(15)
一、研究内容	(15)
二、研究思路	(17)
第一章 陶希圣与社会史论战	(19)
第一节 社会史论战缘起	(19)
一、社会史论战	(20)
二、陶希圣其人	(21)
第二节 社会史论战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	(24)
一、宣传唯物史观	(24)
二、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拓展	(27)
三、社会经济史学科模式的建立	(31)
第二章 陶希圣与“食货”学派的形成	(35)
第一节 陶希圣与《食货》半月刊	(35)

一、“矫正公式主义流弊,创办《食货》半月刊”	(36)
二、《食货》半月刊办刊宗旨及出版发行	(47)
三、《食货》半月刊与“食货”学派	(52)
第二节 陶希圣与食货学人群	(56)
一、建立紧密的师承关系及学术关联	(57)
二、就学术思想及观点达成共识	(61)
三、形成理论与史料并重的治学方法	(71)
第三章 陶希圣与“食货”学派的学术研究	(76)
第一节 学术平台的扩展	(76)
一、《食货周刊》缘起	(77)
二、《食货周刊》刊载“食货”学派论文统计	(77)
第二节 重视史料	(80)
一、理论与史料之争	(80)
二、史料的搜集与整理	(84)
第三节 西方理论方法的引入	(90)
一、译介西方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成果	(90)
二、西方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推介	(96)
第四节 社会经济史专题研究	(102)
一、土地制度	(103)
二、租税赋役及财政制度	(112)
三、寺院经济	(119)
四、宗族及社会等级身份	(126)
五、社会经济生活	(134)
第五节 学术与政治	(138)
一、“食货”学派成员的政治立场	(138)
二、“食货”学派成员学术与政治之纠葛	(145)
第四章 陶希圣与“食货”学派的衰落	(151)
第一节 弃学从政	(151)
一、对抗战时局的观点	(152)
二、参政不知政	(159)
第二节 战时的学术研究	(163)
一、战时的学术活动	(163)

二、倡导“新经学”	(173)
第三节 “食货”学派的终结及其历史地位评述	(180)
一、“食货”学派终结的原因	(181)
二、“食货”学派的学术成就	(183)
三、“食货”学派的历史局限性	(190)
参考文献	(194)
附录 陶希圣著作年表(1899—1949)	(206)
索引	(215)
后记	(216)

绪 论

第一节 题 旨

一、研究背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爆发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近代中国史学史上的重大学术事件，它开辟了两种经济史的研究路向：一种是直接秉承论战，以理论为主导的经济史研究；另一种是扭转论战方向，以史料为主导的经济史研究。^①陶希圣与“食货”学派即是第二种经济史研究路向的代表。20世纪30年代，陶希圣以探寻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以《食货》半月刊为学术平台，摒弃社会史论战时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政论纷争掩盖学术探讨的弊病，高举理论与材料并重的大旗，聚集一批学术旨趣相同的学人在中国史学界掀起一场“食货”运动，对此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批学术旨趣、治史风格及学术观点相近并有着紧密学术关联的学人被称为“食货”学派。由于“食货”学派是以《食货》半月刊的刊名命之，而且学派主要成员学术观点的刊布多以《食货》杂志为主要平台，因此后来的研究者往往将“食货”学派与《食货》半月刊混为一谈，甚至将《食货》论文的作者都归为“食货”学派。学者李根蟠、黄静、苏永明都曾指出《食货》半月刊不等同于

^① 陈峰：《社会史论战与现代中国史学》，山东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

“食货”学派,《食货》作者群并不全是“食货”学派成员。这主要源于在《食货》半月刊上发表论文的学者如嵇文甫、傅衣凌、全汉昇、杨联陞、王瑛、李秉衡、刘兴唐等人,其学术观点及治史旨趣与陶希圣等人相左。而“食货”学派的核心成员何兹全明确说,“食货”学派的主要成员“有陶希圣直接指导的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工作的鞠清远、武仙卿、曾饗和后来与陶希圣有工作关系的连士升、沈巨尘、何兹全”^①。“学术流派,即某一学科的研究者中,因相同的学术旨趣和师承关系而自然形成的具有独特治学观点、方法、风格的学术群体。”^②据此标准,何兹全所言,自为中肯之论。

20世纪30年代陶希圣与“食货”学派成员在创办《食货》半月刊的同时,积极组织食货学会,成立北京大学经济史研究室,在《益世报》开辟《食货周刊》,组织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在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力。从陶希圣与“食货”学派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内容上看,大都是以某一时期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为探讨对象,其中有关于社会身份、人口、家族、土地制度、田赋租税、农业、货币、市场、都市贸易、寺院经济、婚姻制度等方面内容的探讨,如鞠清远的中古门生故吏、元代官匠户研究,何兹全的寺院经济、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及武仙卿的南北朝色役等研究。从研究的时间范围上看,“食货”学派已不再将上古到明清作为一个笼统的时间段做长时段研究,而是集中于魏晋至隋唐时期。他们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发展的转折期。著名的中国古史分期“魏晋封建说”就是“食货”学派通过对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各方面的探讨后而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点。“食货”学派不仅开辟了社会经济史研究新领域、构建新观点,而且提出了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他们将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注重中西比较研究;注重史料与理论方法的会通;提倡研究手段的多样化,注重跨学科研究;倡导学术争鸣,开展学术交流。这些都“引导中国之史学研究进入一境域,为近代中国史学标界立基”^③。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陶希圣放弃北京大学教授的学者生活投身于国民党政权从事政治宣传活动,在其带领下“食货”学派其他成员也纷

^① 何兹全:《何兹全文集》第一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4—595页。

^② 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③ 张春树:《民国史学与新宋学——纪念邓恭三先生并重温其史学》,《国学研究》1999年第6期。

纷投身政治,编辑《政论》刊物,撰写品评时事的论文,“食货”学派的学术活动被迫中断。陶希圣及“食货”学派其他成员大都是国民党员,信奉三民主义,但是对国民党的政治腐败不满,并对中日和平抱有幻想。1939年陶希圣随汪精卫逃离重庆,参与汪精卫对日密谋的活动。“食货”学派部分成员受其影响,也参与到中日“和平运动”中。稍后,陶希圣认识到日本妄图诱降灭亡中国的险恶用心,制造“高陶事件”脱离汪精卫集团,而武仙卿、沈巨尘、鞠清远却出任伪职,自甘堕落为汉奸。至此,“食货”学派成员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发生重大分歧,“食货”学派由盛转衰。1942年陶希圣重回重庆,在蒋介石侍从室任职,并长期担任《中央日报》主编。抗战胜利后,1946年陶希圣召集“食货”学派成员曾謇、连士升在《中央日报》创办《食货周刊》,希望恢复“食货”学派的社会经济史研究,重振学术声望。然而,时过境迁,中国史学研究经过数年的发展,已形成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与新史料考证学派平分秋色的局面。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社会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研治中国社会经济史,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丰富的学术成果。此时,“食货”学派成员身居国民政府要职,依托国民党政府官报从事研究,其学术研究受政治因素影响更加明显。“食货”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的学术研究中,运用唯物史观研治中国社会经济史是他们取得较高学术影响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受政治立场的影响,“食货”学派是有选择地运用唯物史观,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相比,他们的唯物史观是“不纯”的。40年代,“食货”学派没有进一步完善自身的理论建设,而是提出“新经济学”,倡导史学研究的经世致用色彩。这一时期“食货”学派的学术研究侧重于与社会现实有紧密关联的专题研究,希望以史为鉴,为国民党政权的政策实施提供史实参考。这种逆时代潮流而行的史学观及史学研究不仅不能重振“食货”学派往日的学术威望,反而加速了学派衰落的进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食货”学派以陶希圣、沈巨尘赴台湾地区,连士升远走新加坡,何兹全赴美学习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曾謇、武仙卿、鞠清远身负政治罪名无力从事学术研究而告终。

由于“食货”学派政治身份较为复杂,因而人们在研究过程中常将政治和学术等同起来,把学者的政治立场和学术成果混为一谈。这样“食货”学派领袖陶希圣也就有了“资产阶级反动学者”“蒋介石的走狗”等政治帽子,“食货”学派也常被人们视为“反动文人”“反共组织”。与此相关联,“食货”学派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进程中所做的积极贡献也被学界经常有意无意地忽略。

近年来,黄静、苏永明的博士论文《抗战时期史学流派研究(1937—1945)》《“食货派”史学研究》,都把“食货”学派作为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史学流派,对其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就、史学思想、治史方法进行了细致的探讨。这对恢复“食货”学派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无疑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研究目的

就目前的研究状况看,关于“食货”学派发展历程,陶希圣与其他“食货”学派成员间的学术、政治关系,“食货”学派学术与政治之关联,都是需要做进一步探讨的。

第一,多方位地探究“食货”学派的兴衰历程,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明了这一史学派别的发展过程,进而丰富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复杂的时代背景下,“食货”学派同其他学派一样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它因社会史论战而兴起,在摒弃论战中理论空洞、材料匮乏的基础上,突出自己会通理论与材料、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注重中西比较研究的治学特色,在魏晋至隋唐时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建树颇多。对“食货”学派发展历程的深刻探究,有助于我们全面地理解社会经济史研究早期的发展状态,进而有助于全面梳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演变。为达到这一学术目标,我们在将“食货”学派作为近代史学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从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整体发展中来考察“食货”学派的同时,通过对“食货”学派的个体分析反映出社会经济史学科的演变轨迹,进而给予“食货”学派科学的认识。

第二,考察“食货”学派领袖陶希圣与其他“食货”学派成员间的学术、政治关联,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探究陶希圣的学术成就及政治经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科学地总结这一学派的发展规律。陶希圣是“食货”学派的创始人,也是“食货”学派其他成员学业上的导师,何兹全等人都是在陶希圣的指引下,走上研治社会经济史的学术道路的。陶希圣与学派其他成员在研究过程中相互影响、借鉴,形成了丰富的学术成果。陶希圣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著名的社会经济史学家,对其学术成就及影响力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现代学人在对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过程中往往忽视其知名学者的社会身份。通过对陶希圣与其他相关学人学术的探讨,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陶希圣的学术研究,给予他客观公正的评价。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以陶希圣为领袖的“食货”学派于 20 世纪现身中国史坛,在中国经济学、史学领域均有着重要影响。与之对应,迄今为止的研究中,以陶希圣及“食货”学派为研究对象,学界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研究:一是“食货”学派学术平台《食货》半月刊的研究内容及学术贡献;二是“食货”学派成员构成、学术理念及发展轨迹;三是陶希圣及“食货”学派成员的政治活动。

一、民国时期

1934 年陶希圣创办“社会史专攻”刊物《食货》半月刊,即刻引起了学界的关注。1935 年杜若遗和长江分别刊发《介绍食货半月刊》和《陶希圣与〈食货〉》两文,对陶希圣的学术经历、创办《食货》的过程、《食货》的内容做了简单的介绍,并给予这一刚刊行不久的刊物较高的评价:“陶希圣先生主编的《食货》半月刊,批评着过去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缺点,又指示着此后该走的途径。”^①随着“食货”学派成员学术成果的陆续刊布,学界对其治史理念及研究成果给予更多的关注。梁园东的《读物介绍:唐代经济史》、袁永一的《书籍评论:唐代经济史》、皮伦的《评陶希圣、武仙卿著〈南北朝经济史〉》简要地评析了“食货”学派的学术著作,并给予肯定。如称《唐代经济史》“关于唐代租庸调与两税法的内容,作者见解颇为新颖,有它独到的地方”^②,认为《南北朝经济史》一书,“作者关于南北朝经济史料搜集的辛勤,对于中古社会的特色有确切和精彩的论断。这和《读书杂志》的中国社会史论比较起来,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③。“食货”学派以其对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独到见解,及其理论与史料并重的治史理念,得到了学界同仁的认同,并逐渐在学界占有一席之地。1937 年,陈啸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总成绩及其待解决的问题》中指出:“它(《食货》半月刊)代表现阶段中国经济史研究一般的趋

^① 杜若遗:《介绍〈食货半月刊〉》,《文化建设》1935 年第 1 卷第 4 期。

^② 袁永一:《书籍评论:唐代经济史》,《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37 年第 5 卷第 1 期。

^③ 皮伦:《评陶希圣、武仙卿著〈南北朝经济史〉》,《文史杂志》1944 年第 4 卷第 5、6 期合刊。

势。”^① 1944 年秦佩珩在《中国经济史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中认为当时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大势所趋是倾向于《食货》一派,以陶希圣的倡导马首是瞻^②。郭湛波也指出:“陶氏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之贡献,就是他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史’影响颇大。”^③ 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则说:“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陶希圣的研究已替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相当的基础。”^④ 学界在肯定陶希圣及“食货”学派学术价值的同时对其不足之处也客观地指出,如王毓铨在《禹贡》刊布的《通信一束》一文中担心“食货”学派变成史料收集员,提醒他们注意理论与方法的修养。^⑤ 嵇文甫在为马乘风《中国经济史》一书所作的序中肯定“食货”学派在扭转社会史论战中经济史研究理论空洞的弊病的同时,也不讳言“食货”学派只偏重材料收集,而轻视理论探讨的缺陷。^⑥ 由于“食货”学派初现史坛,这一时期的学者大都以介绍《食货》半月刊的办刊宗旨及“食货”学派成员的学术成果为主。虽然学界对陶希圣及“食货”学派各有看法,但总的来说大多给予肯定的评价。直到 1949 年,齐思和在《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中仍认为陶希圣主编的《食货》“是一个著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⑦。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1949 年以后,受时代背景和政治因素的影响,陶希圣的史学成就很少被人提及,偶尔提到者也仅将其当作反面教材加以批判。如 1958 年孙家骥、曾宪楷和郑昌淦发表的《批判陶希圣“前资本主义社会论”的反动观点》一文就认为,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散布过一些反动的历史观点,迷惑过一些人。因此,把他的主要历史观点,和他发动的政治目的联系起来,加以批判是有必要的。^⑧

^① 陈啸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总成绩及其待解决的问题》,《社会科学论丛季刊》1937 年第 3 卷第 1 期。

^② 秦佩珩:《中国经济史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新经济》1944 年第 11 卷第 3 期。

^③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80 页。

^④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1、92 页。

^⑤ 王毓铨:《通信一束》,《禹贡》1935 年第 4 卷第 10 期。

^⑥ 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 1 册,中国经济研究会,1935 年。

^⑦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 年第 2 期。

^⑧ 孙家骥、曾宪楷、郑昌淦:《批判陶希圣“前资本主义社会论”的反动观点》,《历史研究》1958 年第 12 期。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思想解放,陶希圣及“食货”学派的积极作用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如刘茂林的《〈食货〉之今昔》一文指出:“在《食货》半月刊上发表文章的,大多并不怀有反动的政治意图。有些讨论和研究,对当时的学术争鸣,对中国历史问题的探讨,还是起过启示短长、发明得失的作用。”不过他在肯定《食货》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仍认为 30 年代“食货”派的学术研究是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对抗的,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革命围剿。^①

20 世纪 90 年代,一些综论性的政治思想史著作在对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社会史论战的叙述中也开始较多地涉及“食货”学派。如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华夏出版社 1990 年版)第十二、十三章,吴雁南等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四卷本)(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十一编第四、五章,陈哲夫等编《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流派》(三卷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9 年版)第五章第五节等,都不同程度地对陶希圣和“食货”学派加以评述。总体来看,这些著作对陶希圣及“食货”学派的评价是政治倾向重于学术研究,关注点也侧重于思想政治方面,而缺乏对他们史学思想及成就的探讨。当然,类似方面的研究也见诸一些史学史教材中,代表性的有张广智、张广勇的《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陈其泰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胡逢祥、张文建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它们或多或少有对陶希圣及《食货》半月刊的一些介绍。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随着何兹全的《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何兹全学述》《三论一谈:何兹全郭良玉伉俪自选集》《九十自我学术评述》《我所经历的 20 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怀念师生深情忧心国家大事》《我的大学生活》等回忆论著的问世,“食货”学派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中。这些论著不仅为我们研究“食货”学派提供了重要史料,而且提醒人们:“批判陶希圣和《食货》,学术和政治要分开”^②;“《食货》对中国史研究起了一定影响。在 20 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史上,应该有它一席之地”^③。此后,学界有关“食货”学派研究的论文日益增多。李根蟠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发展三题》等文中都肯

^① 刘茂林:《〈食货〉之今昔》,《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 年第 4 期。

^② 张世林:《学林春秋》,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257—258 页。

^③ 何兹全:《我所经历的 20 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 年第 2 期。

定了《食货》在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史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他指出：“《食货》的研究领域也比‘论战’时期大大拓展了，涉及生产、分配、流通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少文章有一定的深度，直到今天仍有参考价值。《食货》中的一些研究具有开创的意义。如陶希圣及其弟子们对‘魏晋封建说’的建构，对寺院经济的研究，把敦煌卷子引入经济史研究，等等。”^①

这一时期，学界开始聚焦陶希圣及“食货”学派，对《食货》半月刊、“食货”学派及陶希圣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等方面均有所研究。

1. 关于《食货》半月刊。朱守芬《〈食货半月刊〉与陶希圣》一文对陶希圣创办《食货》的经过及《食货》半月刊的研究领域、设置的栏目、食货学会会约等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在肯定陶希圣注重对原始材料的阅读和搜集，注重条目索引等方法的基础上，朱文对《食货》半月刊上发表文章的特征进行了概括总结。^② 此外，阮兴的《陶希圣与〈食货半月刊〉》一文从南北学风的异同、陶希圣学术方向的转变、《食货》创刊、《食货》半月刊的影响四方面对陶希圣与《食货》半月刊的学术关联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食货》半月刊在理论探讨、史料收集、研究领域的开拓等方面，为中国经济社会史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开拓出了新的天地。^③ 梁捷的《陶希圣和〈食货〉——民国经济思想丛谈之二》一文主要对陶希圣的生平、早期的学术经历、创办《食货》半月刊的经过、抗战时期政治上的经历做了简要的介绍。该文指出：“当代学者谈论经济史，总是提到郭沫若的名字。郭沫若在1930年写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认为是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开山之作。”“当时另一个学者名气比他大得多，开始这方面工作也更早，他就是陶希圣。”^④ 向燕南、尹静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拓荒与奠基——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史学意义》一文则明确认定：“陶希圣最大的史学贡献，是创办和主持了《食货》半月刊。”“《食货》创办的史学意义，在于明确打出‘社会史专攻’的旗帜，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拓荒与奠基的作用，在中国史学融入世界史学浪潮的历程中，起到了推进的作用。”

^① 李根蟠：《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发展三题》，载侯建新：《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94页。

^② 朱守芬：《〈食货半月刊〉与陶希圣》，《史林》2001年第4期。

^③ 阮兴：《陶希圣与〈食货半月刊〉》，《兰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④ 梁捷：《陶希圣和〈食货〉——民国经济思想丛谈之二》，《博览群书》2007年第6期。

用。《食货》的成功,得益于陶希圣在会通史料与理论值研究理路上的探索。”^①尹静的《从〈食货〉半月刊看陶希圣的史学贡献》(北京师范大学 2004 年硕士论文)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详细的阐发。此外,洪认清在《〈食货〉半月刊在经济史学理论领域的学术贡献》一文中探讨了《食货》半月刊撰稿人在译介国外学者的经济史学理论,在经济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过程中提出方法论,倡导用各种社会科学理论指导经济史研究,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代表了经济史学科发展的新趋向。^②

阮兴是近年来对《食货》半月刊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食货〉与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史学界》一文中指出:陶希圣针对社会史研究中引政论入学术的弊病,倡导史料收集,培植学界新进,倡导交流与合作,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史学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③ 他还在《〈食货〉与中国社会形态研究》一文中就《食货》对中国奴隶社会的有无与封建社会断限问题进行了探讨。阮兴的《〈食货〉与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中山大学 2005 年博士学位论文),以《食货》半月刊为中心,对此刊物的学术内容、学术价值及时代局限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希望通过分析《食货》杂志的学术价值与研究局限,探讨理想的史学类型。^④ 该文是近年来对《食货》杂志研究比较深入的文章之一。

此外,在《食货》杂志撰稿人的唯物史观倾向研究上,陈峰的《〈食货〉新探》一文指出,《食货》的创办思路和唯物史观一脉相承,《食货》的研究路向与唯物史观声息相通,《食货》中的跨学科研究与唯物史观沟通暗合,作者提出假如本书的结论成立,“食货”学派就是唯物史观派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支。^⑤ 李根蟠评价此文把《食货》的唯物史观取向研究的探讨推进了一步。“这些评价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过也有需要继续讨论的地方。”^⑥ 陈峰在《社会

^① 向燕南、尹静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拓荒与奠基——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史学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 年第 3 期。

^② 洪认清:《〈食货〉半月刊在经济史学理论领域的学术贡献》,《史学史研究》2007 年第 4 期。

^③ 阮兴:《〈食货〉与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史学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 年第 2 期。

^④ 阮兴:《〈食货〉与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中山大学 2005 年博士学位论文。

^⑤ 陈峰:《〈食货〉新探》,《史学理论研究》2001 年第 3 期。

^⑥ 李根蟠:《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发展三题》,载侯建新:《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91 页。

史论战与现代中国史学》(山东大学 2005 年博士学位论文)中进一步肯定《食货》杂志从编制论文索引和进行集团分工研究两方面加速经济史走上专业化之途。

以上关于《食货》半月刊的论文多集中在探讨陶希圣创办这一刊物的时代背景、经过,刊物内容,部分学者就《食货》的史学理念及价值进行了探讨。

2. 关于“食货”学派。侯云灏在《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流派略论》一文中简要地介绍了“食货”学派的诞生过程及史学成就。文中指出“食货”学派诞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社会史大论战之后,既是论战的一项积极成果,又把论战引向深入。他们比较早地重视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① 李源涛的《20世纪 30 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进一步就“食货”学派的学术成果进行研究,文中指出“食货”学派在广泛开展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同时致力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的专题研究,如在中古庄园经济形态下土地制度、寺院经济、劳动者身份的研究,及秦汉到宋元的赋税与财政问题的研究,为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创建提供了诸多研究成果。^②

这一时期有关“食货”学派的研究存在学派成员界定相对宽泛的问题,如李根蟠指出:“陶希圣、‘食货’学派和《食货》半月刊是有密切联系的,但毕竟不是一码事,也不应该混为一谈。”“如果说存在‘食货’学派的话,那就是在陶希圣直接指导和影响下从事研究并持有大致相同的学术观点的各位学者(主要是他的学生)。”^③ 黄静也指出陈峰在《〈食货〉新探》一文中把《食货》撰稿人统统视为食货派成员,李源涛在文中将杨中一、刘道元当作食货派成员,是不恰当的。黄静与李根蟠持基本相同的观点,都认为学界对“食货”学派人员的界定过于宽泛。黄静还指出所谓“学派”者,至少应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其一,在学术观点、学术取向、研究方法上有大致相同的认识;其二,有密切的学术联系或师承关系。据此,对“食货”学派的界定不应过于宽泛。^④

稍后,黄静在《食货学派及其对魏晋封建说的阐发》一文中继续指出:

^① 侯云灏:《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流派略论》,《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

^② 李源涛:《20世纪 30 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河北学刊》2001 年第 5 期。

^③ 李根蟠:《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发展三题》,载侯建新:《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95—96 页。

^④ 黄静:《食货学派及其对魏晋封建说的阐发》,《学术研究》2005 年第 2 期。